

从寻求社会协调到追踪社会变迁

—— 法国社会学的历史与发展综述

胡 伟

法国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中具有重要影响地位。A·孔德首先提出了建立社会学的设想，E·迪尔凯姆被称为社会学学科体系和专业体系的奠基人。一个世纪以来，法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法国社会学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是它的创立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迪尔凯姆社会学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战后，法国社会学迅速恢复发展，然后从古典的功能主义社会学过渡到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近十年来，社会学的多样化趋势正在加强，本文试图从法国社会学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课题这两个方面，论述它的整个发展过程。

一、寻求社会协调与一体化的社会学

(1) 社会学的产生

社会学的客体是社会本身。各种社会学说，从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的社会道德论一直到近代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密的财富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学说，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不断具体化和实际化，其中，对社会学影响最直接的是圣西门的经验社会论。

孔德在《实证哲学讲义》（1830—1842）中提出科学的分类次序：根据各门科学的复杂程度依次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最后是社会物理学，数学则是所有科学的基础工具。然后，孔德把社会物理学称为社会学，并且依照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将它分为两部分：社会静力学研究社会内部的协调状态，社会动力学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他认为，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知识的发展相适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神学统治的军国主义阶段，经过形而上学的统治阶段，进入实证精神的产业主义阶段。因此，人类和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社会学的目的就是寻找这种进步的依据。

孔德社会学的特点，首先表现为提倡实证主义。所谓实证，是指对社会的实际情况作出肯定的、精确的说明和相对的解释。因此，孔德主张用数学方法和经验方法去分析和观察社会。法国社会学界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孔德为社会学创始人。其次是综合性，孔德把社会上各种现象都当作社会现象，把社会学当作各门科学的基本和综合，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综合学科。第三，孔德社会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国大革命后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制度。当时法国社会开始进入稳定阶段，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阶级对立的尖锐化和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孔德极为重视秩序和进步的概念，“以秩序为进步的条件，以进步为秩序的目的”，试图通过社会学，达到社会和个人的和谐，达到社会的稳定。

与孔德同时代的托克维尔（1805—1859）和勒普莱（1806—1882）也对法国社会学有着

不可忽视的影响。托克维尔在《美国民主制度》（1833—1838）和《法国大革命与旧制度》（1856）中，分析了民主和权力集中在社会行为体系中的表现，对后来韦伯（1864—1920）和R·阿隆（1905—1983）的政治社会学有一定影响。勒普莱采用直接观察方法和指标分析方法对欧洲多个国家的工人家庭收支状况进行调查，提出了用变量结构分析的差异类型学，促使社会经济学向具体研究发展。

（2）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立

迪尔凯姆在社会学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孔德和斯宾塞（1820—1903）的社会学没有脱离社会自然性的一般论述，没有脱离社会界与生物界一般关系的范畴，没有脱离对人类进化的一般进程的解释。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中，他提出把具有客观事实特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专门的研究对象，同时提出了他独特的研究方法，以使社会学完全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迪尔凯姆批判地继承了孔德社会学的传统，建立了与塔尔德（1843—1904）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塔尔德的《仿效法则》（1890）认为社会现象是个人的内心之间所产生的社会心理现象。这种思想对后来的美国社会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迪尔凯姆则认为社会现象不同于个人心理现象，它独立于个人意识，并且从外部强制个人，是一种客观事物，只有通过社会才能得到解释。《自杀论：社会现象的研究》（1897）和他这种理论应用的具体典范。他把自杀现象与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联系起来考察，通过多变量的统计分析，揭示了自杀作为社会现象的各种规则性和因果关系。在《社会分工论》（1893）中，迪尔凯姆分析了社会类型由简单的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社会分工发展。通过这些研究，奠定了迪尔凯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其中社会功能、社会整合、社会团结、失范等概念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学分析社会机制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工具。

迪尔凯姆亲身体验到当时法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诸如基督教信仰危机、民族意识危机、工业组织危机、教育危机，尤其是巴黎公社革命后社会矛盾的深化，他与上述社会学先驱者一样，对社会的动荡局面深感不安，期望社会学能够象医学对于疾病那样，找到社会问题的科学答案，以重新组织社会，并且使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在共和制的政治基础上统一起来，稳定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以社会协调为目标建立起来的迪尔凯姆社会学，极为重视集体意识对社会行为的作用，重视理性主义，将社会道德、宗教、法律、教育作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3）社会学年鉴与迪尔凯姆学派

法国社会学与大学的不解之缘始自迪尔凯姆。正是在当时刚刚确立不久的公立教育制度中，法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阵地，并且得到了社会的正式承认；也正是通过学校体系，迪尔凯姆成为法国第一个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教授，培养出一批社会学者和他的合作者。然后，依据高等学校建立了专门的学术机构，开展实际的社会学研究。在迪尔凯姆的影响和主持下，1896年创立了名噪一时的《社会学年鉴》。年鉴很快成为社会学活动的中心，一方面，由迪尔凯姆本人及其合作者撰写的年鉴第一阶段12期（1896—1913）各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用社会学方式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对家庭、宗教、行会、教育、法律、国家等社会制度的研究表明了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具体内容和方向；另一方面，通过年鉴的活动，形成了法国社会学学派即迪尔凯姆学派。这一学派不仅在二次大战前一直是法国社会学的主流，而且还促进了历史、地理、经济、法律、语言学、文艺评论等学科的发展。当时几乎所有著名的社会学家，例如M·莫斯（1872—1950）、F·西密安德

(1873—1935)、P·福孔内(1874—1938)、C·布格勒(1870—1940)、M·哈尔布瓦奇(1877—1945)、H·熊彼特(1872—1927)、G·戴维(1885—1976)、L·列维-布吕尔(1857—1939)等都是这个学派的活跃人物。

迪尔凯姆社会学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主张将理论与经验研究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被称为社会学主义。迪尔凯姆去世后,他的后继者们继承了这一传统,同时又开始放弃综合社会学的企图,进一步深化各自领域的具体研究。西密安德和哈尔布瓦奇重视迪尔凯姆的社会形态学和统计分析方法,着重于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阶级的研究。戴维等人重视法律的社会根源,分析了《法律、理想主义和社会历程》(1922)和《政治社会学》(1924)。莫斯、列维-布吕尔和熊彼特则重视迪尔凯姆关于社会生活基本因素和社会类型的理论,侧重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列维-布吕尔致力于分析相对于“文明民族”而言的《原始民族的精神状态》(1922)和宗教信仰。莫斯建立了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中心,在《互赠礼品》(1926)和《社会学与人类学》(1950)等著作中,他将迪尔凯姆社会学具体化。首先是用“整体社会现象”的概念代替作为客观事物的社会现象的概念,指出任何社会现象都与其它一切事物有关,应该从集体的社会结构关系上去理解;其次是建立了行为、信仰和思维的客观形式之间的内部联系;再次是初步指出了语言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互赠礼物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形式,一种契约体系、象征体系和文化体系。莫斯的理论对于后来C·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结构主义有直接的影响。总之,二次大战前的法国社会学开始从综合化走向具体化,出现了社会学分支的萌芽。

与此相应的另一种变化是社会学队伍的分化,一部分人继续在大学讲授社会学,另一部分人则离开大学,到社会资料中心、民族学研究中心等机构从事专门的研究。在大学中,当时只有四个“社会科学”的教授职位,先后由福孔内、哈尔布瓦奇、布格勒、G·理查德、戴维、G·古尔维奇(1894—1965)等人担任。他们在讲授社会学时,不仅讲解迪尔凯姆社会学,而且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例如戴维认为不能把人类现象归结为社会现象,布格勒则多次强调社会学与心理学的一些共同点。从1923年开始的第二阶段,《社会学年鉴》已经不再是一家之言,而是多种观点的共同表达。1924年由莫斯创立的法国社会学中心没有形成社会学思想的中心,只是社会学者们相互照面的场所。

最终导致迪尔凯姆学派解体的是社会的现实。法国在二次大战中遭到德国法西斯的入侵,民族解体、军队投降、国家制度和国家机器崩溃。迪尔凯姆学派长期致力于寻求社会协调的大一统局面,结果事与愿违:社会不整合、人民不团结、国家不统一。人们对于突然发生的事变既无预料、又不理解,社会学所讲的理性主义和科学观点被无情的事实击破,整个法国社会学的传统受到严重打击。同时,由于迪尔凯姆学派的主要人物都是犹太人,在排犹主义迫害下,这个学派的书籍全部被禁止出版,《社会学年鉴》也不例外(直到1949年才复刊)。另外,许多年轻有为的社会学人才,在前线和收容所中丧生了,社会学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直到战后才得到恢复。

二、战后以来法国社会学的主要变化

战后,法国社会学在对传统的理论、特别是迪尔凯姆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反省和批评中得到新生。四十年来,法国社会学在理论、方法、研究目标、研究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显

著的变化。

(1) 研究目标的转变

法国社会长期以来具有下列因素：小农社会、城乡分离、商业分散、教会组织和国家权力对民众影响极大。这些因素的结合构成战前法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战后以来，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危机引起了社会的重新大组合：城市膨胀、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国民生产工业化、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方式同时扩散、工资阶层人数急增；与此同时，出现了消费和服务的社会化、青少年学校教育化和知识化、国家管理机器的科层化、信息传播的媒介化等等。如此纷繁的社会结构变化，使社会学者从面向“过去”转向面向现实，将研究目标从过去那种寻求社会协调转变到适应社会的要求去追踪社会变迁，不仅要对昨天和今天的社会现象作出解释，而且以展望的态度，对明天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方式提出设想。

(2) 社会学理论的变化

社会协调曾经是法国社会学一体化的基础，目的是追求社会稳定。战后，迪尔凯姆学派的正统性受到了批评和指责。社会学者关注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从社会实践出发去观察社会的变化。这一时期社会学的参考理论出现多元化的现象，除了孔德、迪尔凯姆、托克维尔、勒普莱的传统理论以外，德国的K·马克思、M·韦伯、K·曼海姆、E·休塞尔、M·海德格尔和S·弗洛伊德，美国的帕森斯、默顿、P·拉扎斯费尔德等都对法国社会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法国的J·P·萨特（1905—1980）的存在主义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也有深刻的影响。面对社会变化，参考上述理论，社会学者对传统的命题提出了疑问，例如针对迪尔凯姆“集体意识”和“客观社会现象”的命题，提出了“存在”和“社会含义”的概念。战前，主要是关于客观和主观的哲学争论，或者是关于迪尔凯姆学派和自由派之间的争论，战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争论，譬如意识社会学和存在主义社会学、结构主义和互动论等，1968年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的“五月运动”将这些辩论引向高潮。社会学内部几度分化，战前那种协调一致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例如在社会体系与社会行为者、社会整合与社会冲突方面，存在四种主要的理论。从体系与整合的角度，R·布东等人提出了实用的理性主义；从体系与冲突的角度，P·布迪厄等人则提出批判的结构主义。在另一方面，从行为者与整合的角度，M·克罗齐埃提出了社会组织的策略分析，R·阿隆提出了国际关系的策略分析；从行为者与冲突的角度，A·图雷纳则提出了行为社会学。近十年来，理论论战的高潮逐渐过去，人们重新重视对照现实进行思考。过去是以学派排队，各个学派都奉创始人的理论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检验和解释老祖宗的定义。如今，用经验研究成果来提供理论论据的认识显得日益重要。

(3)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法国社会学一方面借鉴英国人类学和人种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地采用直接观察、问卷与访问调查、传记和自传研究以及实地分析等，另一方面引进美国社会学开创的定量和定性调查、网络分析、社区分析等方法，对各种各样的工业点、城市点和农村点进行考察。此外，C·博德洛等人重新重视迪尔凯姆在研究自杀现象时采用的统计分析；拉扎斯费尔德和布东将迪尔凯姆的多变量分析方法公式化。不过，社会调查的质和量的关系仍有不少争论，两者有时候被结合起来分析，更多的时候则是互相排斥。

(4) 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工具得到加强

战后以来，法国社会学的经验分析主要以国立经济研究与统计中心（INSEE）、国立人

口研究中心 (INED) 这两个重要的统计机构所公布的资料为依据进行。法国人口普查系统在19世纪90年代已经健全,但是过去不重视阶级和阶层的概念。1950年对社会职业阶层 (CSP, 1982年以前分为10类, 1982年以来分为8类) 实行正式的分类编码以后, 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产生了飞跃, 借助于这两个统计机构的资料, 社会学者得以收集必要的数据和论据, 开展对阶级、阶层、性别、年龄、就业、失业、教育、社会流动, 以及消费、闲暇、体育等方面的综合比较分析。显然, 如果只靠社会学者去收集这些社会资料, 法国社会学要达到今天的研究水平是不可能的。

(5) 人员、组织和刊物的增加

战后, 由于社会学课程受到重视, 使社会学教育从哲学系统的学科中分离出来, 不仅巴黎和外省的各间大学开设了社会学专门教学, 而且许多高等学校包括一些理工学校也都设置了有关的社会学课程。战前那种只有三四个社会学教授职位的局面已经彻底改观, 目前各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和讲师人数已不下数百名。同时, 以大学为基地, 向教学和科研两个方向发展的法国社会学出现了既分化又交叉的新趋势。60年代以前,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社会学研究所, 其中社会学研究所 (IES) 是社会学人材培养和开展研究的主要场所, 集中了近50名社会学者。1963年在 G·勒布拉斯 (1871—1970) 等人推动下, 成立了法国社会学学会, 促进了社会学的交流。自那以后, 新成立了四五十个社会学研究单位, 这些研究所或者直属国家科研中心 (CNRS), 或者属于大学体系 (其中大多数又同时附属于国家科研中心), 巴黎大学、高等社会科学学院 (EHESS)、巴黎政治大学 (IEP) 是社会学者从事教育和科研的重要场所。此外, 国立经济研究和统计中心、国立人口研究中心和国立舆论研究所等也活跃着大批社会学专门人员。目前, 以微型电脑为重要研究分析工具的新一代社会学者正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 他们将会给法国社会学带来新的局面。

在古尔维希的领导下, 《社会学年鉴》于1949年复刊, 随后还出版了《国际社会学纪要》。接着, 又陆续出版发行了《法国社会学杂志》、《欧洲社会学纪要》、《劳动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纪要》、《人类与社会》、《人口与社会》、《民意测验》等刊物。这些杂志既反映了法国社会学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 又是社会学者之间相互交流和批评的园地。同时, 巴兰哲主编的《社会学家丛书》、H·孟德拉斯主编的《社会学大学教材丛书》、布东主编的《社会学丛书》等出版了一系列社会学专著, 社会学知识的积累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此外, 国立经济研究和统计中心出版的《经济与统计》和大型刊物《社会资料》汇集了社会学者对社会进行详尽分析的许多论文, 对社会各部门的影响正在加强。近十几年来, 公共行政部门和一些大企业逐渐从过去对某些专门研究机构实行资助的形式转向直接订货的政策, 不少社会学研究所越来越多地参与这些合同研究项目。法国社会学这一走出学校和研究机构、面向社会需求的新现象, 更加强了它追踪社会变化的趋势。

(6) 社会学分支的发展

社会的变化、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社会学园地的扩大, 促进了法国社会学的分化。一方面, 在社会学的外部, 社会学与一些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并且依附于其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分离; 在社会学的内部, 人口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也与它们的社会学母体相分离。近十几年来, 跨学科综合分析的观点重新受到重视, 邻近学科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不仅研究项目开始由不同学科的各个研究所共同进行, 而且社会学研究领域也出现细分化和研究课题分支化, 社会学从大体系和大理论的设想转向

小体系和“中层理论”。同时，通过划分对子的方式来界定社会学各个分支的正式领域，例如城市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劳动社会学与闲暇社会学、家庭社会学与教育社会学、职业培训和就业社会学与失业社会学等。在每一对专门领域里面，又常常会继续细分下去，出现了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分支。法国社会学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而且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上，都出现了多样化趋势。

三、追踪社会变迁与社会学的多样化

这种多样化的趋势可以从战后法国社会学发展的具体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由于篇幅有限，下面着重论述一些主要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影响较大的社会学家及其研究成果，同时注意将历史发展的次序和研究课题的深化相结合。至于不少社会学者的研究同时涉及几个领域，则基本上略而不谈。

(1) 劳动、工业、职业阶层和社会运动

战后初期，法国社会面临着经济恢复、工业化发展和城市重建等问题。在古尔维希和弗里德曼等人的影响下，劳动社会学首先得到发展，并且占据了五十年代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古尔维希在《工业化和技术专家统治》（1949）中，注意到现代技术将使传统的工艺和技能以及劳动分工发生根本变化，指出不能将技术后果和组织决策后果相分离。弗里德曼认为劳动是人类生活的共同目标，而现代的机械化妨碍人们的自觉性劳动，使劳动非个体化，因此必须重视劳动的自由意志和个性的发展，使人们获得职业选择和职业培训的机会。纳维尔着重研究自动化劳动及其影响，主张人类劳动的目的不在于效率而在于享受。同时指出自动化未必会直线地实现无人工厂的神话。弗里德曼和纳维尔主编的《劳动社会学文集》（两卷本，1961—1962）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作了总结。

另一方面，图雷纳等人则注重工人意识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在《雷诺工厂工人劳动的转变》（1955）中，他描绘了机器与人的关系中三个基本发展阶段，即由以工艺为中心的职业体系A阶段，经过以组织为中心的体系B阶段，到以劳动依靠自治的C阶段的发展。在三个不同阶段中，企业结构、工会组织、以及工人家庭生活方式都有不同的反映。图雷纳分析了技术进步与工人意识的关系，指出工人的行动是一种强烈的集体意识和冲突意识相结合的产物。他在《工人意识》（1966）、《行为社会学》（1965）、《工人运动》（1984）等著作中不断深化社会运动这一概念。C·迪朗接受图雷纳的主张，阐明了《工人意识与工会活动》（1968）的战略和战术变化。F·博恩的《新工人阶级和革命》（1971）和S·马莱特的《新工人阶级》（1963）和《工人权力》（1965）分析了“新工人阶级”的扩大及其行动意向，认为只有先进产业的专门技术工人是认识资本主义体制固有矛盾，实现工人民主自治管理的主要力量。根据这个观点，B·默莱特提出了他的《工业社会学》（1971）理论，并且对《工资制度和企业主政策》（1966）进行具体的研究。A·高兹在《工人战略与新资本主义》（1964）中批评以往的社会主义斗争脱离日常生活的状况，提出要重视从满足工人基本要求出发，向满足“历史的要求”进展。他还认为工人阶级已经《向无产阶级告别》（1980）。M·威莱特在《工人的生活空间》（1979）和《工人的劳动》（1982）中则认为战后以来法国工人的状况虽然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仍然处于社会的低层，一方面工人阶级分为新工人和旧工人、或者单能工人（O.S）和技术工人（O.Q），另一方面存在着两种劳

动市场，一种是就业稳定、劳动条件和劳保福利较佳的内部市场，一种是就业不稳定、缺乏职业培训、劳动条件差的外部市场。迪朗的《失业与暴力》（1981）和M·佩罗的《工人罢工》（1979）指出当前的失业危机冲击这些不稳定的就业者。上述研究构成了社会运动分析、行为社会学、以及工人阶级社会学的主要方面。

伴随着对工人的研究，工会的角色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雷诺的《法国的工会》（1963）和S·莫斯科维西的《工业的再改变与社会的变化》分析了法国工会的性质和作用的历史变化，指出法国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阶级的工会主义，不过这种阶级的团结往往通过工种群体、工业各部门、或者同种企业的中间联系而形成。图雷纳认为，有关劳动买卖条件的争论已经不再是引起一切社会对立的争论，工会遭到了危机。但是，正如雷诺等人指出，工会已经制度化，在企业中牢牢地建立起来，在冲突与谈判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人们注意到各种职业阶层的地位和态度差异。R·吉罗在1961年就对白领阶层的社会性格作过调查。克罗齐埃在《公务员社会》（1965）中分析了白领阶层的个人晋升和为了维护集团利益而参加工会的社会背景。此后，出现了一大批对于干部阶层、公务员阶层、工资劳动者阶层进行研究的论著。N·泡兰查斯根据各种新变化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阶级》（1974）理论。孟德拉斯在《社会变迁》（1983）中认为社会分层的重心已经转向中等阶层及其文化。目前，对社会各阶层的研究仍在深化。

（2）都市、社会发展、农村、社区

法国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开始于50年代初。1951年，在弗里德曼主持下，社会学研究所召开都市和农村问题研讨会，会后出版了《城市与农村》论文集。当时主要研究城市迅速膨胀、城乡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同特点及其对立，以及乡村对于都市社会模式渗透的抵制等问题。随后，P·乔治从社会形态学和社会地理学的角度论述了《城市与都市现象》（1952）和《农村与乡村现象》（1856）的不同发展条件和道路。P·H·桑巴德洛韦指导的研究所所以工人生活条件为课题对《巴黎和巴黎居民点》（1952）进行经验调查，指出工人阶级既是城市阶级、具有本身文化的阶级，又是生活条件匮乏的阶级。P·卡埃注意到五六十年代的城市增长是在原有城市的周围建筑高层集体住宅，而《生活在高层集体住宅》（1963）中的人构成了另一个法国，即来自外国的移民工人、进城农民、以及年轻劳动者。H·科因进一步提出，不仅要观察工人阶级对城市化和城市高层住宅的适应，而且要注意所有居住环境的变化以及由于住房变化引起的生活现代化欲望。H·勒费孚尔则将日常生活中各种群体的活动看成社会实践的基础，批判了城市密集现象和郊区工资劳动者受排斥的现象，认为这种恶性膨胀的城市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P·克莱克通过对《高层集体住宅与新郊区》（1967）的调查，发现80%的法国人喜欢独立住宅。H·雷蒙从城市《建筑与生活环境的的关系》（1984）论述了住房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另外，M·卡斯泰尔则以功能主义的观点指出一系列《城市问题》（1975），认为国家的科层组织控制导致了《住房危机与城市社会运动》（1974）。

经济的增长、城市的膨胀、工业技术的扩散，使法国农村迅速演变。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现代化的发展，使传统的农村家庭经营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大量流失。P·朗博分析了《农村社会 and 城市化》（1969）的关系，认为必须明确现代社会变化的目标，以求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协调。孟德拉斯则预言《农民的终结》（1967），指出农业经营者将取代农民的概念，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的变化是急待研究的问题。法国农村

社会学具有社区研究的特色，主要以村庄为研究单位进行实地调查，涉及大部分农村地区，试图建立各种乡村社会的模型，以进行理论比较。其中较突出的是孟德拉斯和M·若利威主编的《法国农村社区》（两卷本，1971和1974），对农业经营和农民家庭的转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民在法国社会和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农村社会的转变进行比较分析。孟德拉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民社会》（1977）的理论。

由上述研究产生了对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的比较。1976年至1982年，由国家科研中心下属的20个研究所对全国16个城市和农村社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了解各种社区的特征、全国性趋势的汇集、以及各种社区在整体趋势中如何保持各自的特殊性。孟德拉斯等人的《社会变迁》（1983）总结了这些调查的结果。目前，这一社区调查已经扩大为“法国社会和文化变迁长期观察”，由34个不同学科的研究所共同进行。法国社会学有着参与社会预测的传统。从50年代末起，社会学者就参与制定和实现全国规划以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促进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现代化。F·富拉斯蒂埃在各个时期多次对法国社会进行预测，著有《1975年的文明》（1960）、《1985年的文明》（1970）、《2000年的文明》（1984）。不过，社会学者在不同时期的参与方式有些不同。起初是建议性的参与，以1968年“五月运动”为转折点，许多社会学者公开指出第五共和制下法国社会所逐渐暴露出来的根本矛盾，并且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近十年来，人们似乎对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更感兴趣，以批评和建议相结合的方式参与社会规划。

（3）法律、宗教、舆论、政治、组织

法律、宗教、政治等问题是迪尔凯姆学派的传统研究课题。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中，曾经研究了法律的产生、法律的进程与社会变化的适应以及社会集团内部的秩序。福孔内、莫斯、熊彼特等人分别分析了社会责任、法律的功能和法律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关系。较成体系的是古尔维希的《法律社会学》（1968）。他认为法律是现实社会环境中企图实现正义的理想表现，所谓体现法律，就是要确定社会关系、集团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标准范围。H·拉韦-布吕尔（1884—1964）则相反，根据社会学主义的传统，把法律和社会变化、法律的根源和发展原因作为法律社会学的主要课题。J·加尔博尼埃在《法律社会学》（1978）中进一步认为必须通过法律条文去分析法律现象，同时参考社会心理和语言学研究以及舆论调查的结果。另一种相反的看法受韦伯理解社会学的影响，主张把法律作为一种价值事实去理解。这两种方法论对法国法律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宗教研究领域受迪尔凯姆强调社会整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理论的影响很深，同时也接受了勒普莱的定点调查方法。战后，在勒布拉斯的推动下，继续战前已经实施的大规模调查，取得了第一批研究成果：《法国人参加宗教活动的历史概况》（1945）和《法国农村中人们参加宗教活动的图表》（1947），弄清了法国基督教的历史状况。J·絮特则《从民意测验看法国人1944年到1976年的宗教生活》（1984），分析了人们的宗教态度的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F·伊桑贝尔和E·布拉特指出天主教仍然是法国大多数人的宗教，不过固守教规的人越来越少。许多法国人一方面不希望宗教干预私人生活和个人伦理领域，另一方面仍然希望作为传统文化支持者的教会在现代重要的公共争论中继续发挥作用。

法国的公众舆论研究开始于30年代，斯托艾泽尔于1938年创立了“法国公众舆论研究中心”（IFOP），后来因战争而停顿。1945年战争一结束它又恢复了活动，随即出版《民意

测验》季刊。斯托艾泽尔和吉拉尔等人一方面吸收了接受过塔尔德影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理论，另一方面以法国的社会舆论结构和动态作为主要课题，同时对投票运动、政治社会化等问题予以关注。目前影响较大的是“法国民意测验调查所”（SOFRES），该所从1966年起发行研究简报，从1984年起出版《公共舆论》年鉴。如今，通过民意测验进行的舆论研究已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机制，它的运转与社会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产品推销商，在决策过程中都必须参考有关的舆论行情。与此同时，大众传播社会学也活跃起来，出现了J·卡泽纳夫的《电台和电视社会学》（1962）、F·巴尔和J·莫索的《信息传播社会学》（1975）、G·拉格诺等人的《广告社会学》（1977）。

迪尔凯姆从社会稳定出发，十分重视阶级合作、国家自主、民主制度等政治问题。戴维从图腾社会的状况出发，分析了权力集中的过程。战后，M·迪维杰首先研究了现代国家机器的臃肿和权力机构的复杂化现象。他在《政治制度》（1946）、《政党社会学》（1951）和《政治社会学》（1973）中，把政治社会学当作一门权力的科学，一门关于制度化的统治关系的科学。阿隆认为政治社会学必须以政治运动的研究作为主要课题，尤其要重视投票运动和社会舆论的变化、选举与选民、政党组织和科层制等问题。P·比尔博姆和F·夏泽尔在《政治社会学》（1978）和《权力的范围》（1985）中分析了国家权力结构和职能。比尔博姆还与B·巴蒂一起提出了《国家社会学》（1979）理论。而图雷纳则认为只有那些反对专家统治现象的权利主张所形成的社会运动，才是政治社会学的主题。另外，巴兰哲着重于研究殖民体系解体后第三世界的转变、新独立国家的权力体制与现代化问题，认为第三世界引进现代技术是经济独立的必要手段，但是同时必须考虑到它对人们传统生活结构引起的不满和紧张。

另一方面，在克罗齐埃的倡导下，从60年代初起开始了组织社会学的研究。他的《官僚制现象》（1963）和《闭塞的社会》（1970）发展了韦伯和托克维尔的理论假设，分析了法国行政官僚机构的集权化和等级制，指出所有组织都是权力关系的整体而形成的结构，与此相关，所有权力关系都是产生组织的开端，这导致了对《行为者与社会体系》（1977）和社会决策的研究，促成公共政策分析这一新学科的发展。

（4）家庭、教育、闲暇、文化

战后，法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口首先随经济成长而急骤增长，然后又随经济危机转向缓慢增长，与此相适应，劳动人口流动、就业人口的波动等问题也显著起来。A·索维的《人口通论》（1957）分析了人口老年化、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化的社会原因，提出了人口政策调整的问题。接着，人口社会学在吉拉尔、G·卡洛等人的领导下，以国立人口研究中心和国立经济研究和统计中心为基地发展起来，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人口与社会问题的论著。

与人口研究相应的是家庭社会学的发展。尤其是从60年代中期起，家庭危机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演变、结婚率和生育率的降低、离婚和同居夫妇的增加、独身者和单亲家庭以及非婚生子女的急增，使法国家庭结构和家庭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吉拉尔首先研究了法国人《配偶的选择》（1964）问题，然后，L·鲁塞尔和O·布尔尼翁等人从1975年起对《法国社会的婚姻》（1975）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分析了《新一代与传统婚姻》（1978）、《法国青年的同居现象》（1978）、《结婚与离婚》（1980）等问题。F·德森格利和C·泰罗特则分析了家庭社会地位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A·米歇尔在《婚姻

和家庭的 sociology》(1972)中指出家庭关系中男女的不平等问题，M·塞加兰在提出《家庭社会学》(1981)理论的同时，分析了妇女劳动对社会的影响。目前，对夫妻关系的 sociology、妇女社会学、青年社会学和老年社会学的研究也在开展。

在迪尔凯姆社会学理论中，教育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在他去世后，这一研究似乎中断，直到六十年代初才重新受到重视。P·布迪厄和 J·C·帕塞隆的《遗产继承：学生与文化》(1964)和《社会再生产：教育体系的理论基础》(1970)分析了高等教育和学校的社会功能，为社会各方面对法国大学的无效性进行批评提供了论据，从而使教育社会学成为法国社会学争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C·博德洛等人的《法国资本主义学校》(1971)指出了法国两种不同教育体系的社会功能，一种是培养体力劳动后备军，另一种是培养白领阶级。这本书在教师中曾经引起极大的政治影响。布东的研究方法与众不同，他运用系统分析和“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研究教育和社会流动的关系，指出工业社会里人们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1973)的强度及其延续。

业余时间社会学在六十年代初作为劳动社会学的补充提出来以后，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课题。目前，法国城市劳动者每年工作时间已经从19世纪的4 000小时减少至1 600小时，每周工作39小时，工休两天，不仅建立了60岁的退休制，而且每年有五周的带薪度假，除了必要的睡眠时间以外，业余时间已超过工作时间。J·迪玛瑞杰首先考察了法国人业余活动的方式，认为这是现代人自我开发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并且当它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时候，还可以发挥创造性。富拉斯蒂埃在进行社会预测时，提出了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业余活动的问题。E·莫林在《时代精神与群众文化实验》(1962)中进一步指出，现代的业余活动是工业社会和第三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随后，根据60年代以来的不同特点，人们先后开展了广播电视社会学、旅游社会学、体育社会学的研究。

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人们对各种文化形式的重视。L·戈德曼在《小学社会学》(1964)中根据“发生论的结构主义”，提出文化创造和文化意识可以作为文学社会学的对象。J·迪维葛淖特在《歌剧社会学》(1965)和《艺术社会学》(1972)中认为艺术世界的客观表现产生了个别社会中的文化共同体，体现了社会的各种概念。卡泽纳夫从普遍流行的日常性，提出了《礼仪社会学》(1966)。R·穆兰则分析了《法国的油画市场》(1967)和《艺术市场与文化官僚制》(1981)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把法国社会学战后的发展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恢复和更新阶段，主要围绕劳动社会学的课题进行；**第二阶段**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社会学开始向分支化和专门化发展，城市和农村、工业和组织、社会行为和大众文化都成为社会学的重要课题；随着经济增长的中断，开始了60年代末以怀疑为标志的**第三阶段**，教育体系和社会运动是争论最激烈的方面，行为、冲突和策略的概念受到普遍重视；七十年代末以来的**第四阶段**，社会学的多样化进一步发展，随着微型电脑的普及和多学科交流的展开，社会调查和研究更加重视试验分析和定量分析。面对上述变化，社会学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讨论。法国社会学与整个西方社会学一样，面临着社会新的挑战。

作者工作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严立贤